

防御性视角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策略研究[#]

——以明清社会动乱下的漳州地区为例

Study on Defensive Strategy of Space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Case of Zhangzhou City during Social Turmoil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黄源成¹ 许少亮²

1 厦门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副教授

历史环境保护与更新研究所 所长

2 漳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注册城乡规划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变迁下的传统村落空间机制、特征与发展研究——以漳州为例”(18YJCZH059)；厦门理工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闽南传统村落宗祠建筑文化研究》(YKJ19007R)；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福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复合型防灾机制与当代启示研究》(2021J011203)；厦门理工学院科研攀登计划资助项目《防灾视角下的闽南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XPDKT20035)

1 传统村落形态研究的空间防御性视角

所有生物以及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等非生物体系的存在、发展均与其安全性息息相关^[1]。防御性正是基于安全需求所作出的应对，并在不同的学科视野及其对象层级上展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以城乡规划与建筑学学科中的传统村落研究为例，其所处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技术背景，共同孕育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防御工程，并以此彰显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为了安全，人多容易保卫^[2]”，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村“聚族而居”组织特征原因的一种理解。在传统村落形态的早期研究中，静态性描述是主要研究方法。近年来，随着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防御性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基于形态生成演变的动态机制研究成为新的认知方式。因此，本文结合明清时期漳州民间社会动乱的历史背景，试图从防御性视角出发，探析传统村落形态的独特空间策略，并发掘先民基于不同人居环境的生存智慧。

2 明清时期漳州民间社会动乱的历史追溯

根据历史记载，明清时期漳州的民间社会动乱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种是不同族群因为区域内部资源的竞争而引发的斗争；一种是区域外的倭寇匪患通过掠夺的方式进行暴力侵犯。

【摘要】在特定社会历史的时空背景下，防御性需求参与塑造了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形态。以福建漳州地区为例，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动乱频仍，在独特自然与人文因素影响下，当地传统村落逐渐演化出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的地域性防御体系。当前，学术界对漳州传统村落防御性的研究较少且大多侧重于村落个案与文史层面的分析，缺乏对其进行系统整体性与物质层面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市域尺度与空间层面入手，探析防御性视角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设计策略。

【关键词】漳州；传统村落；社会动乱；防御性；空间策略

这种严峻的刚性防御需求，深刻地影响了漳州传统村落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历史进程，并在传统村落形态的生成与演变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1 内部资源竞争：不同族群的相互博弈

明清以降，由于人口的不断繁衍漳州逐渐变得地狭人稠，族群之间在土地、水利、码头、风水等资源上的竞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不同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主要表现为民系之间的“土客械斗”与不同族姓之间的“宗族械斗”两种类型。“土客械斗”，泛指明朝中期到清朝末期在南方五民系内部发生的以争夺生存资源为目标的民间械斗，是不同民系之间为了争夺资源的一种极端行为的表现形式^[2]。在漳州的民系中，闽海民系形成较早，在客家人迁入之前，闽海系早已在沿海最好的环境下生存定居，并建立了稳固的社会组织，成为闽南地区的强势群体。然而，随着后期人地关系矛盾的加剧，闽海系与客家系之间的生活与生产空间边界逐渐衔接乃至重叠在一起，于是彼此间开始争地、争水、争山林乃至争风水，矛盾、冲突与械斗日见尖锐和频繁。志称：“漳俗好斗健讼。”宗族械斗，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不同族姓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这种冲突的发生，源自于生活必需物质资源的相互争夺，因为每个族群都需要依赖一定的自然资源才能确保其生存发展。基于共同保护或

争夺某种利益，以及面对外部的威胁，一个彼此认同的社会团体会团结起来对抗^[3]，由此将引发族群之间的冲突，如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漳州碧溪、玉兰两村宗族械斗^[4]。

2.2 外来资源掠夺：倭寇匪患的单向侵略

“倭之来在海，或仗我中国人为船主，彼登陆又仗我中国人为地主。盖倭以剽劫我中国人为利；而我中国人则往往以得主倭为利，浙直皆然，闽为甚，闽之泉漳尤甚^[5]。”明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倭寇匪患严重。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受命管理福建军务，“经略海上防倭戍守”，通过实地考察，在漳州沿海由北而南依次修建了4座临海城堡以守护海防前线，分别为镇海、六鳌、铜山、悬钟^[6]。漳州兵力占福建省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福建为东南要地，水陆官兵倍于他省。以漳州为沿海要地，倍与他洲^[7]。”除了官方所兴建的海防工事之外，民间沿海百姓不得不纷纷筑堡自卫，以宗族为基本单位，或依附于强宗大族修建土楼、寨堡，结成半军事性质的社会性组织，以抵倭患。这是当时漳州沿海土楼与堡寨迅速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明朝初年，漳州各地的土堡、土楼并不多，然而到了嘉靖时期则广为修筑、蔚为大观。抗倭斗争促进了漳州土楼的修建，以至于这一时期从沿海直到山区的各类具有强烈防御性质的土楼约有300座^[8]。华安县高车乡济安楼至今保存了一份明末崇祯十七年乡民旨在共同防御倭寇的会盟书^[2]，有力地证明了漳州地区土楼的诞生与发展与当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有关。

除了倭寇之外，土匪乱兵的侵扰也是百姓之患。据《南靖县志》记载，清末太平天国期间农民战争爆发，农民军曾在南靖烧杀抢夺，石桥村一带山高谷深，成为农民军转战之地。太平军经过石桥村，村中无人能抵抗，只能逃进山里躲避，太平军在村庄中又烧又抢，长篮一片损失最大，万石楼被火烧毁，长篮楼只剩一半，洪坑坝上的建筑也受到不同程度损坏^[3]。

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防御性空间策略

3.1 巧借自然地形的选址

作为村落建设的首要任务，选址对于村落的整体防御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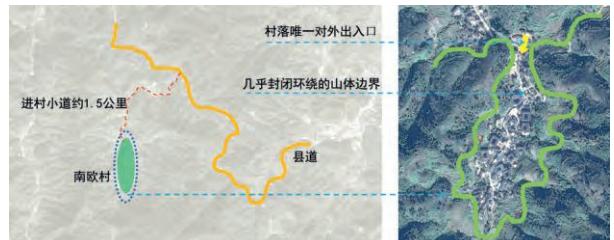


图 1 南欧村选址示意图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古代生产力较弱、经济较不发达的情况下，“依山阻险以自安”，能够充分借助“地利”的自然条件进行防御，是降低防御建设成本、增强防御效果的有效手段。漳州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使不同区域传统村落充分结合各自的地理特征，将其作为村落防御方式的自然基础。

（1）南欧村：区位偏僻，利用地势险阻

《易·习坎》中云“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9]。”南欧村位于漳州西北部偏远且山地连绵不绝的南靖山区，不仅远离县城，而且村址主入口距离主要的交通干道——县道约1.5公里，两者通过一条狭长且曲折的乡间小径相互联系，同时所在的山林形成自然视觉屏蔽，这种独特的区位非常隐蔽不容易被外界发现，成为乱世中难得的世外“桃花源”；村落主体为几乎封闭环绕的山体所围绕，仅留出北面一处狭窄的对外出入口，整体呈现为袋形的空间结构；村落周边的梯田可供粮食生产自给，茂密的原始风水林一方面是村落河流水源的涵养之地，更是危急时刻可以逃难的场所。南欧村的村址在军事上可谓“易守难攻”，具有很强的内向防御性（图1）。

（2）庄上村：丘陵平台，获取安全视野

除了有村落隐于山林的案例之外，有的山体则作为“配角”融入村落而成为其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平和县庄上村为例，早期呈现为堡寨式的空间格局，村落开基者叶氏先祖独具匠心，将一丘陵包围于村落之中，并巧妙利用中心山体的自然高差，使内部村民在高处的平台上能够以360度视角眺望远近，以充分了解村寨外围的安全情况。这种借助自然地形的方式可以省略村寨四周兴建瞭望式角楼的经济投资（图2）。

（3）菜埔堡：利用自然水系，设护城河

护城河的处理手法源自于远古的“沟封之制”，一般环绕于城墙外侧，以其深度和宽度强化防守功能^[10]。《易经》泰卦云“城复于隍……^[11]”；东汉《说文解字》称“隍，城池也^[12]”；《易·习坎》中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13]”。以上文献说明了除了修筑高大城墙外，通过开挖濠池可效仿河川天堑，以成“固若金汤”之言。在平原地区，虽然缺乏自然山体作为据险扼守之地，但在堡墙之外仍然可以开挖沟渠并结合自然水系以强化防御能力。



图 2 庄上村选址示意图

云霄县菜埔堡位于漳江旁，并与漳江保持一定的距离，除了可以有效避免汛期或暴风雨所引起的山洪危险，还可以将漳江的自然水源导入村落城墙外围以形成环绕式护城河，在提供生活生产用水、排水排污、交通运输、生态优化、消防灭火等功能之外，更是与城墙巧妙结合为一体以共同构建坚固的多级防御体系：护城河是一级防御，通过吊桥与外界联系；封闭厚实的城墙是二级防御；堡内的封闭式民居单体是三级防御（图3）。

3.2 营造“迷宫式”布局

在村落空间防御体系的建立上，村址的选择是第一步工作，紧接着便是村落规划布局的考虑。在一些传统村落中，基于村址所在地形的前置基础，建造者因地制宜地通过道路的规划与街巷的组织来形成扑朔迷离、难以准确与定位的空间感受，让外来入侵者迷失方向、产生恐惧以陷入被动的局面，这是一种以内向防御性为主的模式。

（1）山重村与洪坑村：“不规整”的街巷

对于初次进入村落的外敌而言，他们需要通过对村落街巷路网的把握与定位来确定入侵的行程路线，否则容易迷失，因此村落的街巷路网设计是防御性的关键。

以长泰县山重村为例，古村落里共有数十条长短不一、错综复杂的古巷道。在布局结构上，这些古巷道以又窄又深、纵横交错、相互穿插的“叶脉”状为特征，同时巷道左右两侧民居的外墙与巷路都用了不规则的鹅卵石叠砌，进一步强化了迷宫式的视觉效果（图4）。

芗城区洪坑村亦然。其南侧的闽南古民居沿着弧形的“鸿湖”水池排开，南北纵向的退让不一，并且在空间格局与建筑风格上非常相似；村内的大小道路纵横交错，在横向与纵向上呈现出长短不同、虚实相间的不规整格局。这种处理手法，让

入侵者一时难以分辨方向。并且，古厝与古厝、古厝与护厝、护厝与护厝之间的门户相连，可便于战时物资与人员的协同作战。村落南北面均有带状人工水池，可防火攻（图5）。

（2）赵家堡：“棋盘式”布局与“丁字”路口

在空间防御上，赵家堡除了外围环绕的坚固城墙作为第一道防线外，其布局亦是不离防御性的宗旨。基于自然地形的原有特征，为了防御外敌的入侵，古民居群主体的街巷通过纵横交错的“棋盘式”布局、设置台阶坡道等方式营造出富于变化的景观与扑朔迷离的氛围^[14]；而且，这些街巷的主干道并不是完全笔直延伸的，而是顺着地势的走向蜿蜒转折，有些是弯曲转折了一定的角度，有些街道甚至会出现90°的拐弯，形成拐角式“丁字型”路口，令外侵者在路口处易迷失方向，具有突出的军事防御功能（图6）。

3.3 运用外围线性的边界

凯文·林奇对边界曾作这样的描述：“边界是两个部分的界线，是连续过程中的线性中断^[15]。”村落边界，其意义在于可以一定程度上抵御外界各种环境变化对村落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维护了传统村落整体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与安全性。漳州一些传统村落采用了堡寨式的边界，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典型的设防聚落形式，这种“外围线性设防”主要可以分为“城墙与角楼结合”、“居住与防御相结合”两种类型。

（1）治安堡：防御特色鲜明的城墙

治安堡的城墙周长约1200米，环形连通便于360度全方位地察看周边安全情况。城墙宽约2.6米（含跑马道），高约6.7米，且外墙面光洁，外敌不易攀爬。墙身外侧女儿墙高约2米、宽约0.5米，便于防守，女儿墙共设356个垛口，便于通过垛口了解敌情与射击外敌。城墙以花岗岩条石砌筑，坚固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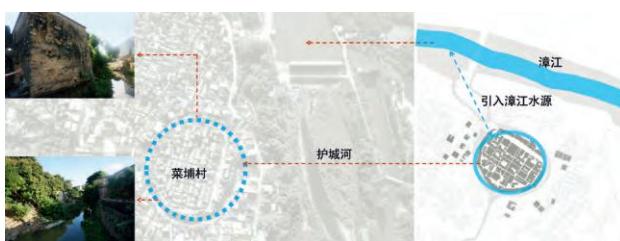


图3 菜埔村选址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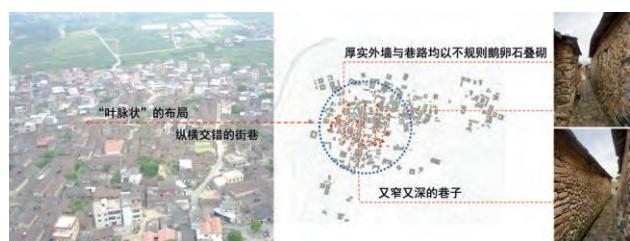


图4 山重村布局示意图



图5 洪坑村布局示意图



图6 赵家堡布局示意图



图 7 治安堡的城墙与角楼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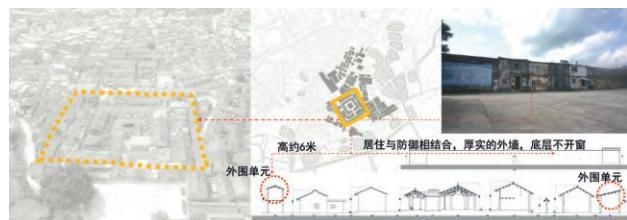


图 9 山河村“震山古寨”边界示意图

跑马道宽约 2.1 米，除了在结构上稳固城墙之外，还可作为战时粮草、兵力与信息的流通要道。东西南北共有四个城门，作为进出城堡的交通要塞。在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位各设一个角楼，其瞭望窗和射击孔可用于察看险情和攻击外敌，弥补城墙转角处防御功能的不足，同时增强整体防御能力。城门和角楼两边设踏步，可以方便与城墙之间的交通联系（图 7）。

（2）菜埔堡与山河村：居住空间与城墙相结合

聚族而居的社会组织模式与堡寨式空间的防御性需求，促使漳州一些村落外围单元的居住功能和防御功能紧密结合，即外围的防御性墙体既是防御工事也是居室的围护结构。村落居民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成为保卫者。以云霄县菜埔堡为例，平面近似椭圆形，外围城墙周长约 600 米，除了主要出入口区域之外，大部分为“住防功能合一”的单元式民居所环形相连而组成，内侧一层有入户门，房间进深约 3 米。堡墙用三合土夯筑，经分层夯实时墙体坚实且防水性强。外墙厚达 0.6 米，高逾 4 米，最高处达 10 米，底层不开窗，顶层有开小窗，有的屋顶设城垛，防卫者可在制高点远眺、站立向外射击（图 8）。

诏安县山河村早期为“震山古寨”，外圈两层高约 6 米，房间共用隔墙紧密相连，底层不开窗，二层开小窗，由此形成环绕、封闭、连续与厚实的外墙，这种将防御性与居住功能性紧密结合的处理方式，既有效节约有限的用地和降低总体造价，同时还具备了良好的安全防御能力（图 9）。

4 结语

在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动乱的驱动下，漳州传统村落首先“因地制宜”借助自然地形的选址优势以降低防御建设成本、增强防御效果，其次“匠心独运”营造了“迷宫式”布局以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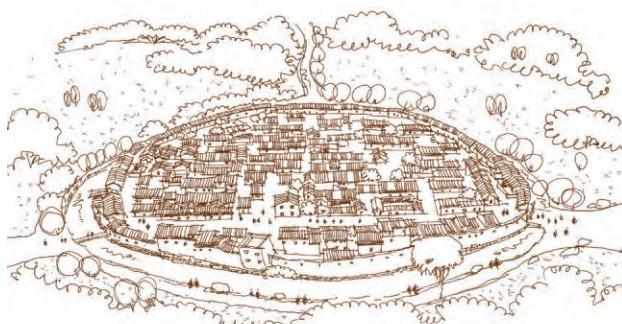


图 8 菜埔堡复原鸟瞰图

成扑朔迷离的空间感受，最后“一箭双雕”以外围复合化的线性边界维护了村落整体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与安全性，由此诠释了村落多元一体的地域性空间防御策略。

图表来源

均为作者自绘或自摄。

注释

- 1) 安全性，一方面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撑，一方面满足了生物尤其是动物的本能心理反应与精神需求。对人类而言，安全环境更是实现身心“安居”之关键。在马斯洛对人类需求层次的分析中，安全需要仅次于生理需要。
- 2) 会盟书的主要内容为：参与会盟的人员名字、会盟的目的所在、会盟的组织架构、违反会盟约定的惩罚机制、会盟立约的时间等。
- 3) 部分资料参考自石桥村村落档案。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著. 费孝通自选集 [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16.
- [2] 潘安，郭惠华，魏建平等著. 客家民居 [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29.
- [3] 周蓓著. 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研究 [M].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 53-59.
- [4] 黄艺娜. 宗族势力的消长与清初地方秩序的重建——以福建漳州碧溪、玉兰宗族械斗为例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107-114.
- [5] 郑镛. 明代漳州倭患与民众抗倭 [J]. 闽台文化交流. 2006(3): 29-33.
- [6] 许初鸣. 漳州的四座海防古城 [J]. 闽台文化交流. 2006(3): 153-155.
- [7] 郑镛. 明代漳州倭患与民众抗倭 [J]. 闽台文化交流. 2006(3): 29-33.
- [8] 郑镛. 明代漳州倭患与民众抗倭 [J]. 闽台文化交流. 2006(3): 29-33.
- [9] 陈婷婷. 我国城市护城河历史地段的更新改造研究 [D]. 华中科技大学，2005:11.
- [10] 李博洋. 明清北京护城河恢复与保护研究 [D]. 北方工业大学，2015:3.
- [11] 宛华. 四库全书精华珍藏本》 [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6: 49.
- [12] 王本奎. 周易象意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 98.
- [13] 林之满. 中华典藏精品 周易全解 [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72.
- [14] 孙晶. 漳浦赵家堡聚落历史研究 [D]. 华侨大学，2013:114.
- [15] [美]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 [M]. 方益萍，何晓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5.